



王 良 著

立 此 存 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



安徽大学出版社



王良 著

立此存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此存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王良著.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1

ISBN 7-81052-218-3

I. 立… II. 王… III. 日本—侵华—历史—1894~1945 IV
.K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152 号

立此存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 王 良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张	7.5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字数	190 千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52-218-3/K·19 定价 1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70年代初,安徽几所高校的政治理论系科被调整到皖南山区一所大学里。那时节正处在“文革”“斗、批、改”中,在当时十分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什么问题都能“上纲上线”,知识分子们大多学得很乖,言行谨慎有余。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并不太熟,在一次教工学习会上,一位江浙口音的同志发言,慷慨陈辞,敢触时弊,讲的很有见地。我问别人此公是哪路神仙?答曰王良是也,“大炮”。

生活在山沟里,自然十分封闭,一旦有人群存在,也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人不多反而容易混熟。王良君给我的印象除了富有正义感、敢说敢讲之外,多数场合总见他很好学,常揣着报刊资料。他注意吸收,难怪思路敏捷,并善于动手,勤于笔耕,常有文章见报,几次拿着文稿向我征求意见,我却讲不出什么道道。生活中他好与杜康为伴,只要多喝上两杯,嘴上就失去了把手,侃起来没根。我担心倘若有人开个“玩笑”,比如打个小报告什么的,他碰到的麻烦将不堪收拾。

“文革”后,王良君打道回府,调到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结束在皖二十几年的高校教学生涯。几次通信中他都寄来自自己的新作,依然壮心不已,埋头史学研究。这回他风尘仆仆携来一捆书稿,我有幸又做了第一读者。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历史才能显现出昨天的真相是非。史学家的天职是通过严肃的研究,把历史的真相和良知展视给读者。我通读书稿之后,可以说比较系统地认识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和根源,重新受到一次历史教育。

过去在阅读现代史资料中,印象较深的几个材料是:世界列强向中国发动无数次侵略战争,大肆抢掠中国财富,其中就战争赔款一项而言,要数日本得到最多,大概占 16 亿两白银的 1/3 以上。这是当时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最沉重的经济负担;再从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的摧残来看,仅在抗日战争几年里,日本侵略军残杀了 3500 万中国军民,占二战中全世界死伤人口的 40%,创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纪录。南京屠城之残暴,令德、意法西斯自叹弗如。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自身的死亡人数包括它在东南亚、太平洋及广岛的伤亡,还不及中国的 1/7。这场战争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以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中国的牺牲和损失太大了,这笔帐罄竹难书。尽管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去挖掘研究,但仍嫌不够。

现在日本有少数披着学术面纱的人和右翼势力相勾结,公然兴风作浪,他们热衷于抹煞侵华战争罪责,绞尽脑汁,散布谎言,竭力回避和歪曲这段历史真相。在报刊上撰文胡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出来的”,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一小撮人,年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不加任何掩饰,公开为嗜血战犯招魂,这是典型的不低头谢罪的丑恶表演。正视历史还是篡改历史,真理和谬误,良知和昏昧,一直在严酷的历史现象中相互对峙着,彼此抗争着。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有句名言:“不向历史学习,还会重复历史的错误。”一个国家敢于承认过错,承认不光彩的历史,需要一定的勇气,也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去开拓新的未来。

社会学家研究过二战后的德国。同样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其认罪态度与日本大相径庭。德国政府明确提出“克服过去”的口号，全盘承认历史罪过。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虔诚地跪在犹太人殉难者墓碑前谢罪。他们的总统在演说中指出：“背视过去的人，结果是对现在的盲目，不牢记非人行为的人，还会重蹈覆辙。”德国政府从国库拨出巨款 1223 亿马克（相当 79495 亿日元）向受纳粹迫害的牺牲者赔偿。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做法是明智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和平已经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人民热爱和平，诅咒侵略战争。所以要在历史中有所领悟，这就不能忽略历史，歪曲历史，更不能欺骗历史。让历史戳穿谎言，使人民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再不要使历史的悲剧重演。

《立此存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实际上是一段痛史，是一本刻骨铭心的教材。它是用血的昭示告诉我们，国弱必受欺凌，落后就要挨打。日本所以敢于疯狂在中国杀人放火大肆侵略，就因为它看准了旧中国政治上腐败衰朽，经济上极端落后，毫无招架之力，中国虽也有无数血和火的较量，但大多以失败告终。我们要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牢固地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不放松。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将是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要么在竞争中崛起，国强民富；要么在竞争中衰败，再度被人宰割。经济竞争依然是十分残酷的。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求发展，停滞和后退，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为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迎头赶上去。

重温这部痛史，还启迪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力量

量。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是激励我们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难,所以没有倒下,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长城,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夺取最后的胜利。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筑起新的长城,不但能够战胜大江大河的洪水肆虐,而且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居安思危,使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向心力,积极投身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立此存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报告》出版之际,应作者之邀,以此拙文为序。

邵 长 兴

1998 年 10 月于淝上

目 次

序 言	邵长兴
引 言	1
一 军国主义崛起	3
二 以甲午侵华战争发迹	12
三 对我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22
四 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	30
五 提出“二十一条”	44
六 制造军阀混战	64
七 挑起“九一八事变”	84
八 向华北侵略扩张	98
九 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	120
十 实行南京大屠杀	146
十一 疯狂进攻解放区	174
十二 导演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190
十三 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206
附录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事年表	223
后记	230

引 言

邓小平在 1987 年 5 月 5 日对日本友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①

确实，日本存在着一种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1982 年，就发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把日本“侵略”中国改为日军“进入”中国，妄图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1986 年，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国土厅长奥野诚亮和松野幸泰、防卫厅长官中西介信、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厅等，又接连发表歪曲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抵赖日本侵略罪行的言论。同年，在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竟把日本侵华战争渲染成日军“被迫应战”，竭力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辩解和开脱。近年来，这一小股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更加活跃。他们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宣扬什么日本当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和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了维护日本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230 页，人民出版社，1993。

正当权益”，胡说“七七卢沟桥事变”“不是日本挑起的，而是中国军队干的”，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侵华战争是日本“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对中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侨民的行动的一种反应”。这些极端荒谬的论调，既颠倒了历史，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遭到亵渎。尽管他们人数寥寥，但能量不小，影响极坏。

因此，我们不能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这段历史事实公诸于世，立此存照。

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必不可少的前提。承认而不是否认这段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1998年8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参时就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得到的最深刻启示是，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①。

^① 见《浙江日报》，1998年8月10日《要闻》。

军国主义崛起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它位于太平洋西侧，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 4 个大岛和 1000 多个小岛组成。在历史上，中日两国有着 2000 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但是，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崛起后，在 1894 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就一直把侵略矛头指向和它一衣带水、有着源远流长历史关系的中国。

（一）“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

“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闭关自守的国家。以德川家族出身的“将军”为首的“幕府”，是日本的最高统治机构，掌握着全国政权。天皇高卧京都，无权过问。将军、大名（被将军分封在各地的大封建主，也叫“藩王”）和他们的家臣、武士等封建统治阶级，占有日本全部土地，对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19 世纪 5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使日本面临着半殖民地化的严重危机。在国内外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以农民为主体的日本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

1868 年，日本发生了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萨摩（今鹿儿岛县）、长州（今山口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一部分属佐贺县，一部分属长崎县）等藩的下级武士（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联合一批京都贵族和商业资本家，利用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幕府的冲击，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宣布由日皇睦仁“亲自执政”，组成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明治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和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它通过“奉还版籍”等措施，取消了封建领地制度，并宣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地主和资本家获得兼并土地的自由，同时迫使失去土地的大批农民转化为资本的奴隶，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劳动力市场。对于“奉还”了“版籍”的领主和因此失去俸禄的“武士”，明治政府则发给他们大批“公债”作为补偿，促使他们向资本家和地主转化。

明治政府还在全国实行了地税改革，把原先征收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租税，进一步确认在封建领主经济瓦解过程中兴起的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并保证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

地税改革是明治政府推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地税改革后，地主从农民身上榨取占收获量 60% 以上的地租，其中一部分以地税形式缴纳给政府，另一部分中的很大数额则被

投资到银行和企业中去。明治政府利用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庞大的地税，经营多种国有企业，兴建铁路，购置轮船，并扶植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商人。

在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明治政府把发展军事工业作为重点。它接收并扩建了幕府和各藩的制铁所、兵工厂和造船厂，还新建了炮兵工厂和其他军事工厂，以及电信、矿业、机器制造等企业。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到 19 世纪 80 年代，由于加速推行原始积累和广泛采用机器，日本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884 年底至 1890 年，日本各产业（农业、矿业、工业、运输业）公司的资本从 1341 万日元增加到 18935 万日元，增长 13 倍；民营机器纺纱厂，从 19 个厂 5 万枚纱锭，增加到 30 个厂 27.7 万枚纱锭。从 1880 年起，明治政府还把军事工业以外的国有工厂、矿山，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使他们尽快由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并逐步在机器制造、矿业、航运、纺织和银行等部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明治政府进一步把发给原领主和武士的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连作为全国最大地主的日皇的动产，也大半投进了日本银行、日本邮船和日本铁道等大公司的股份中。1889 年，日本国有银行资本总额的 83% 是由俸禄公债转化而来的。从明治维新到 1893 年的 25 年中，日本工业资本增加了 13 倍，商业资本增加了 3 倍半；银行业，1875 年只有 4 家，到 1880 年短短的 6 年间，就增加到 151 家，增长了 40 倍。

日本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的软弱，大商业资本家长期以来和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他们在倒幕运动中，和下属武士结成联盟，并让这些人掌握了主导权，因此在进行资产阶级改革时极不彻底。无论城市和农村，都保存了浓厚的半封建关

系。地税改革后，皇室和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贫困破产；大批佃农实际上仍然处于半农奴地位。在城市里资产阶级除残酷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外，还进行种种超经济剥削。工人工资极低，每天通常劳动 14 至 18 个小时，生活状况十分恶劣。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在日本工人、农民的血汗和白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情况，促使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仅在 1868 年至 1884 年的 17 年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 250 多次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873 年 6 月福冈县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参加者达 30 万人，起义群众不仅捣毁或焚烧油盐店、粮店、酒店、高利贷业等 4000 家富户，而且广泛袭击官府、县厅。面对日益剧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明治政府便竭力扩展军事力量，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人民的反抗，并妄图利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

当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当时，英、美、俄、法等国掠夺了大片殖民地，控制了广大的国外市场。后起的日本在这些方面远远落后。而且日本明治政府从幕府手里继承下来的不平等条约还没有修改，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日本仍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等特权。这与日本大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向外扩张的贪婪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关税不能自主，连本来就很狭窄的国内市场也为外国商品所侵占。如 1889 年，日本棉纱国产量为 2551.4 万斤，输入量却达到 4281.1 万斤；1890 年，国产量虽增至 3631.8 万斤，但输入量仍有 3198.8 万斤，外国棉纱占据日本国内棉纱市场的极大部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便企图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发动侵略战争，急起直追。

正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实现的，因此，资本主义改革并不彻底，大量封建因素仍被保留下来。明治维新时的许多封建领主和武士，后来转化为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身兼国家的高级官吏。这些人扶摇直上，后来形成“财阀”、“垄断资本集团”，加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国家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来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因而具有很大的侵略性，所以列宁称它为“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二）“布国威于四方”

由于日本国内保存着半封建土地制和保持着对英、美等列强的半从属地位，日本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内市场极度狭小。日本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为了摆脱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危机以及解决它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便使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天皇制政权起着重要作用。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把“武国”和扩张定为基本国策。1868年3月14日，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宸翰》（即天皇御笔信）中，公然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从这种狂妄野心出发，日本统治集团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所谓“富国”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充实国力，以便有足够的财力、物力进行扩军备战。所谓“强兵”就是要建立起强大的武力，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以实现其“耀皇威于四方”。1880年，日

^① 转引自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4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本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在《邻邦兵备略》中叫嚣：“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就是要以武力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正是在这样一条军国主义路线的指导下，明治政府使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都为军事侵略服务，一切都围绕着军国主义化这根主轴旋转。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建立起天皇制官僚机构的同时，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据 1890 年统计，以军工为指导的日本工矿交通企业已达 1653 家。其中从幕府中接收、扩大的东京炮兵工厂，专为陆军制造步枪；新建的大阪炮兵工厂，制造大炮和重兵器。到 1893 年，日本陆军的兵力平时为 6.3 万人，战时可达到 23 万人（包括 10 余万人的后备队）；海军已拥有军舰 32 艘，排水量达 6 万余吨，还有鱼雷艇 24 艘，排水量近 1500 万吨。日本统治集团把建立起来的军队叫做“皇军”，意即天皇的军队。日皇直接掌握军队，“统帅陆海军”，并给这支军队的头目们以种种特权，形成日皇与军队一体的军事体制。1878 年 12 月，又设立日本参谋本部，作为直属日皇的军令机关，它所掌握的用兵作战等军令事项，内阁不能过问。

为了严格控制军队，使它成为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特别加强对军队内部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1878 年 8 月，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强调培植“皇军精神”，要求军队必须做到“忠实”、“勇敢”、“服从”；绝对尊崇天皇，就连天皇的容貌等事，也不得议论，更不许私议朝政。1882 年 1 月 4 日。又发布了天皇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必须遵守“忠节”（崇拜天皇、效忠帝国）、“武勇”（黷武好战、勇于卖命）以及“礼仪”、“信义”、“质素”（即服从命令、克服自我，做天皇的驯服工具）等五条“武士

道”规范。通过从建制和训练等一系列手段，日本统治集团把日本军队造成一支毫无政治头脑，只知为军国主义效忠卖命、野蛮杀伐的奴隶队伍。

明治政府还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警察制度。1871年，在东京府设“逻卒”3000人，这是日本近代警察的开端。3年后，普遍设立了全国统一的“国事警察”。当时，警察头子川露利良就露骨地说：“要强化帝权，必先强化警察”，希望“日本成为警察国家”。在这种“警察国家”的反动口号下，日本警察不断增加，遍及城乡各地，当时全国已拥有首都警视厅和692个警察署，1400个派出所，严密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①。

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明治政府积极扩军备战，大量增加军事预算。到1892年，日本军费支出增达3450万日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40%强。军费开支在预算中所占比例之大，是当时世界各国所不曾有过的。

明治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向日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武士道”精神。从小学起，就进行所谓“皇道”（尊重天皇、忠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神道”（信奉天皇为神，宣扬日本是由“神”产生的“神国”）的愚民教育。1890年，天皇又颁布了《教育敕谕》，命令日本人民恪守“武士道”、“神道”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到在家当“孝子”，在外做“顺民”、“忠臣”；为维护天皇的神威，要不惜“刺刀见红”、“肝脑涂地”。

^① [日] 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上册），177页，商务印书馆，1972。